

《韩非子》语言研究

魏德胜 著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韩非子》语言研究

魏德胜 著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韩非子》语言研究/魏德胜著.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

ISBN 7-5619-0507-6

I. 韩…

II. 魏…

III. 韩非—语言—研究

IV. ①H109.2②B226.55

出版发行: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印刷:北京林业大学印刷厂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版次: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5.5

字数:150 千字 印数:1—1500 册

定价:8.5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诸侯兼并、诸子争鸣	1
第二节 韩非其人及其思想	4
第三节 研究《韩非子》语言的意义	7
第二章 语义研究(上)	10
第一节 大量出现新词的时代	10
第二节 词义激变及其规律	28
第三节 同义词例析	49
第三章 语义研究(下)	67
第一节 专用术语的改造和创新	67
第二节 表现韩非核心思想的语义网络	85
第三节 语义部分小结	101
第四章 结构研究	105
第一节 复音词的发展及估价	105
第二节 稳中有变的句法结构	121
第三节 古汉语虚词体系的完善及其影响	133
第四节 结构章小结	139
第五章 表达艺术	143
第一节 篇章旨趣明确	146
第二节 文章结构缜密	149
第三节 论辩坚实有力	152
第四节 韵文化的倾向	162

第五节 孤愤的氛围	166
第六节 表达艺术章小结	168
主要参考文献.....	171
后记.....	172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诸侯兼并、诸子争鸣 ——韩非生活的时代

韩非生活在战国末期，诸侯列国即将结束长期争战，而这时候也正是战争最残酷的阶段。“战国七雄”的局面已被打破，秦、齐两国形成东、西对峙，公元前 288 年 10 月，秦昭王和齐湣王同称西、东帝。《韩非子·内储说下》：“穰侯相秦而齐强。穰侯欲立秦为帝而齐不听，因请立齐为东帝，而不能成也”。这次称帝只持续了两个月，没能最终成功，但反映出了当时的形势。韩非所在的韩国这时已由“七雄”之一，沦为仰人鼻息的弱国。韩非亲历了祖国衰落的过程，在同秦国的战争中，韩连遭败绩：公元前 294 年，秦攻取韩的武始、新城；次年，韩、魏联军又被秦将白起打得大败，损兵二十四万；前 290 年，韩被迫割让武遂二百里予秦，前 265 年，秦又大规模攻韩，几年间，韩又失去了上党等大片国土。韩是秦通向中原的必经之路，秦一直把韩看成“腹心之病”（《韩非子·存韩》：李斯上秦王书），在秦的蚕食之下，韩实已成为秦的附庸，韩非在上秦王书（《韩非子·存韩》）中说：“韩事秦三十余年，出则为扞蔽，入则为席荐。”哪里还有昔日三晋大国的威风。就在韩非死后两年，韩就被秦攻灭，置为颍川郡。

这种动荡的时代，这样惨痛的祖国危亡的意识，对韩非这个爱国者来说，是个深深的刺激，这是他发奋读书学习，力图为治国寻

求一条光明之路的直接动力。

从春秋到战国的几百年的战火具有改朝换代的特殊意义，奴隶制的最后一个政权周王朝，正日趋衰落，新兴生产关系的代表地主阶级在战火的洗礼中诞生、成长起来了，这个世界文明的发祥地正经历着一场彻底的社会大变革，封建社会在血雨腥风之中就要来到这个世界。政治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礼崩乐坏”，维护奴隶制统治的各种等级制度正在瓦解，贵族阶层的特权正一步步丧失，广大的地主阶级要求平等，昔日是“刑不上大夫”，如今是“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战国时期，屡屡见到贵族遭受刑罚的例子，秦商鞅黥太子傅，楚廷理戮太子御（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战国末的荀子还声称：“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荀子·富国》）这种“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观念只能是儒家“复礼”思想的反映，早已不合时宜了。《管子》说：“故禁不胜于亲贵，而罚不行于便群，法禁不诛于严重而害于疏远，庆赏不施于卑贱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重令》）贵族阶层已到了它的最后阶段，广大的地主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施展抱负。下层的有志之士逐渐被各国君主重用，秦张仪驰骋各国，游说连横，周苏秦挂帅六国，扣关攻秦。皆极一时之盛。

自春秋时期，私学之风越来越盛，正适应了广大下层人士渴求知识，希望参与国政的迫切愿望，导致了一场持续几百年的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多事之秋，也正是英才辈出之时，这场学术争鸣涌现了一批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思想家，谱写了我国学术史上最光辉的一页。诸子争鸣以春秋战国时期为盛，秦汉时期为其余波。韩非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后一位大思想家，在他之前诸子的各主要流派都已出现，这为他汲取各家的养分、熔铸自己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条件。

在这种纷争的社会，诸子争鸣的焦点必然是治国的方略。不管

是儒家的孔孟，还是道家的老庄，以及法家的商管、墨家的墨子，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怎样平息诸侯的纷争上。儒家以为混乱的原因是“礼崩乐坏”。要天下太平，必须恢复礼制，君臣上下服从礼的约束，人人要具有仁德的修养。道家以为乱的原因是聪智的运用、纲法的设置，使得宁静的自然界失去了平衡，只有弃圣绝智，回归自然，才能达到小国寡民的宁静。墨家把混乱的原因归结到奸诈、战争。要求人们兼爱、非攻，人人以治天下为己任，艰苦劳作，建设家园。儒、道、墨等，都没有多少实际的管理政事的经验，多是学者的坐而论道，故而同现实不大合拍，实际上都是行不通的。早期法家管仲、商鞅，是齐、秦的相国，主持一国大政，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应该说，他们都是成功的，齐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秦雄居战国七雄之首。齐、秦两国能成为战国后期东、西对峙，相互抗衡的强国，与商、管的法治是分不开的。现存《管子》、《商君书》反映了他们的部分思想，是他们法治理论的总结。

今本《管子》除保留了部分管仲的思想外，还记录了齐国稷下学者群的思想观点。稷下学宫是战国时学术活动最集中的地方，集一时之英才智士，在这里进行学术活动的有各家的传人，而以道家为多，孕育出了对战国以后思想界和政治生活都有重大影响的黄老思想。其思想是以道家为主，融合了法、儒、阴阳等各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系。

韩非思想的直接来源除黄老、商管外，还有慎到的“势”论和申不害的“术”论。申子、慎子的书已散逸，我们今天只能从辑得的残篇断简中一窥其思想的大概。

战国中后期，诸子思想正由早期的各自对立而走向相互融合，从《管子》反映的以黄老为主旨的思想体系，我们已可看到融合的端倪。到韩非更是以黄老思想为基础，以早期法家思想为主体，兼采其他诸子的思想成分，形成自己的一套。这种思想合流的趋势，从战国晚期一直沿续到汉代。

第二节 韩非其人及其思想

韩非，约生于公元前 295 年，是战国末期韩国的宗族公子。从《韩非子》中我们可以知道他非常熟悉历史，了解战国纷争的大局。可见他博览史籍，关注时事。中年曾师从在楚任兰陵令的荀子，与李斯同学，李斯自认为没有韩非学得好，心存嫉妒。后来韩非回到韩，而李斯离开楚国，去了秦国，以图施展经世之才，果然受到秦王的赏识。此时的韩非已是成熟的政治家了。他可能在韩国做过一般的管吏，但不受重用，遭到当权者的排挤和打击。他多次上书韩王言治国之道，都得不到采纳，满腔的报国热忱得不到理解。《韩非子》中屡屡斥责“当途之人”、“重人”，当与他的经历有关。他愤然写下《孤愤》、《五蠹》等文，《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他“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秦王政读了《孤愤》、《五蠹》等文章后，慨叹不已，李斯告诉他这是韩非所写的，秦王于是加紧攻韩，想得到韩非这一奇才。韩迫于秦强大的攻势，派韩非出使秦国，《史记》称“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李斯可能是害怕韩非会取代自己的地位，于是对他进行谗害，公元前 233 年，韩非在狱中被李斯用药毒死，死时约 60 多岁。等秦王醒悟，急忙召见韩非时，韩非早已死了。这一经世奇才一生忧叹祖国遭侵，为小人当道、壮志难酬而悲愤，最后又因别人的嫉恨而惨死，终生是这样的抑郁寡欢，终因锋芒太露而到处受人打击，连司马迁也感叹他精通进言之道，却“不能自脱”，没能有一次进谏成功，这是韩非的一大悲剧。

韩非在愤疾的一生中写了很多著作，《韩非子》一书，五十五篇，十余万言，这在先秦的作家中是不多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他：“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这准确地概括了韩非政治思想的特点，即以黄老思想为其哲学基础，法、术、势三位一体的统治术。

黄老思想是战国中后期社会上颇为流行的思潮，形成于齐国的稷下学宫，今本《管子》很能反映其思想倾向。主导思想是崇尚道、法，主虚静无为，并且讲求形名。“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于诸生。”（宙合）“治民一众，不知法不可。”（七法）“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伤其身。故曰：欲而无谋。言谋不可以泄，谋泄灾极。”（宙合）“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毋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动，以观其则。”（心术）“是以圣人之治也，静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正名自治之，奇名自废。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白心）

这些思想都为韩非所采纳，并加以进一步发挥，使之系统化，以道、法为中心，虚静无为为羽翼，构成了韩非统治思想的主体。特别是对虚静无为，韩非把它提到君主权术的高度，反复强调，要求君主隐藏自己的思想，以法为标准来评判臣下。“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扬权）“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有度）并且否定了《管子》中“言室满室，言堂满堂”的观点，认为“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难三）

韩非思想中对老子思想的吸收，主要是黄老思想的影响，同《老子》原意是有些不同的，虽有《解老》《喻老》的篇章，实则是改造了的《老子》。

韩非法的思想有很多来自商、管，如：

重爵禄、农战：《商君书·农战》：“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管子·牧民》：“授有德，则国安；务五谷，则食足。”《韩非子·八奸》：“明主之为官职爵禄也，所以进贤才，劝有功也。”《韩非子·和氏》：“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

重法轻智：《商君书·壹教》：“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智虑。”《管子·任法》：“圣君任法而不任智。”《韩非子·饰邪》：“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

严刑：《商君书·说民》：“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无从至矣。”《管子·法禁》：“废上之法者，必负以耻。”《韩非子·饬令》：“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

不赦罪：《商君书·说民》：“圣人不宥过，不赦刑。”《管子·法法》：“凡赦者，小利而大害。”《管子·法禁》：“刑杀毋赦。”《韩非子·爱臣》：“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谓威淫。”

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相似的言论，如都认为要去除文学、智辩之士，都认为要赏罚面前一律平等，等等。又，《韩非子·饬令》基本上同《商君书·靳令》，《韩非子·有度》也多同《管子·明法》，他们的思想之间关系之密切于此亦可见。

韩非思想与前期法家不同的地方还在于他融合了众家思想而形成更加完善、精密的体系。一般谈韩非思想的必要提到慎到的“势”与申不害的“术”，韩非之所以直接吸收了他们的思想，跟他们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是分不开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明确说慎到“学黄老道德之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只不过他们的思想各有侧重，申子、慎子的书我们今天已不能见其全貌，但从逸文中也可发现他们都讲法，只是申子重术，慎子重势，这在《韩非子》里已有明确的记载。韩非舍其一偏，在共同的哲学基础上，融其长处，法、术、势并重。正因为有相通的哲学基础，所以这几种理论融合后相得益彰，毫无窒碍之处。

韩非的政治思想是比较成熟的，无怪乎会得到当时的明主秦王的赏识，李斯也是法家，其思想也有和韩非相通的地方，韩非虽然没能亲自实施他的统治方略，但他死后，秦王政、李斯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他的理论，例如韩非反对臣民非议法令，反对私学，李斯也说：“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史记·李斯列传》）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这种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有人说秦的灭亡是韩非思想在现实中的碰壁，这种说法并不妥当，秦的灭亡有其多方面的原因，

不能全部归结到韩非的思想,如秦二世的骄奢淫逸,大兴土木,“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听乐”(《史记·李斯列传》)就同韩非主张君主要有节制的思想不合。秦二世把全部政权交给赵高,任其为所欲为,正是韩非所极力反对的,是韩非所认为的亡国的情形之一。所以秦的灭亡并不是韩非思想的失败。事实上韩非的君主专权的思想对中国的封建统治有极大的影响,确实对巩固封建政权起了作用。

第三节 研究《韩非子》语言的意义

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书面语的历史就有三千年以上。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汉语的发展变化是很大的,今天的人如果不借助于古人的注释,是很难读通古书的。

汉语的发展变化的历史经过了两千多年的研究,已基本摸清了它的大概,但还有很多问题没能解决。比较系统的汉语史研究的时间并不太长,因此汉语史还需我们花大力气去钻研。汉语史研究中各个门类的进展情况也不一致,其中语音史的研究比较系统、深入,已经有了分段细致、描写全面、对发展变化的脉络有详细叙述的汉语语音史专著。而词汇史、语法史的研究相对来说较薄弱,虽然也有一些专著,但或是专题论述或是分段粗疏,尚未能形成完整的体系。

拿上古汉语来说,一般只归入一个阶段。可是从先秦到两汉,有书面语言的历史就有一千年左右,其中有丰富的书面语材料的就有商周秦汉这几个时期。在上古汉语内部,存在着较大的发展演变。

在上古汉语的发展过程中,战国汉语具有特殊的地位。语言的发展一般受制于它所存在的那个社会以及语言自身的因素。如上所述,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完成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

变,经历了几百年的动荡。社会的激变给语言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所以战国语言表现出了很多新的现象,同社会生活一样,也经历了一场激变。

《韩非子》是战国末年的作品,它忠实地反映了战国汉语的现状。从《韩非子》来看,战国汉语有如下的特点:

词汇方面,新词大量增加,词义变化激烈,整个词汇体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词汇是语言中变化最快的部分,因此从词汇体系的演变最容易看出语言的发展变化。一般说来,词汇中基本词汇较为稳定,但战国时期,随着词汇体系的激烈发展,基本词汇体系也有了改观。这更可以说明战国汉语在汉语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战国时期的词汇发展对中古汉语,乃至近现代汉语都有重要意义,这个时期产生的很多新词新义至今仍活跃在口语中,如:船、瘦、狗、绕、切齿、靡靡之乐(音)、洋洋编编(洒洒)、雕琢(“修饰”义)、冠(“第一”义)、牢(“坚固”义)等等。

如上所述,韩非思想具有集大成的性质,这一点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语言中。《韩非子》中借用了很多他以前的其他思想家使用的名词术语,而为了契合韩非自己的思想体系,又对这些名词术语的含义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改造。理一理这些词语的含义的发展变化,不仅对汉语词汇史研究有意义,而且可以促进先秦思想史的研究。

语法方面,变化虽没有词汇那么明显,但也可以看出一些趋势。总的看,逐渐向着规整的方向发展。先秦汉语的用法“活”的特点在慢慢减少。构词上,复音词在迅猛发展,量上有了较大的增加,但在整个词汇中,尚未能超过单音词;构词方式上则没有多少改观,述补式、主谓式还没有独立成为构词方式。句法上,“活用”现象减少,如双宾语结构中几乎看不到特殊的动宾关系。形容词在主宾语位置上的出现受到限制等。虚词体系上,整个系统进一步完善,关系类虚词有了较大的发展,初步形成了汉语的虚词体系,同实词

体系相对独立构成了汉语词汇体系的基本格局。战国时期的语法的发展变化对汉语发展史 also 具有重要意义,如双宾语结构的类型至今基本维持着战国时的状况、战国虚词体系成为统治中国文坛一千多年的文言的虚词体系的基础,历代为广大文人学习、使用,使我们对两千多年前的古代文献并不感到陌生。

在语言表达方面,《韩非子》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从先秦的诸子散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政论散文由萌芽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政论散文肇端于《论》、《老》,发展于《孟》《庄》,而成熟于《荀》、《韩》;《韩非子》中的政论散文结构完整、观点鲜明、论证详当,代表了我国早期政论文的最高水平,韩非对我国政论文的成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战国以后的政论散文基本上没有越出《韩非子》的规范。《韩非子》一书成为历代文人学习的范本,滋润了无数的文章大家,“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就声称是直接承继先秦古文的。

《韩非子》是一部在汉语发展史、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等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著作。因此,研究《韩非子》的语言不仅对汉语史和中国文学史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等等都有重要意义。

《韩非子》中绝大多数篇章是韩非的作品,其中也有些篇章受到怀疑,还有些明显不是韩非的作品,如《存韩》篇后有李斯上秦王书及李斯使韩、上韩王书。但本文以分析语言为主,涉及思想内容的地方不多,所以除非必要时,一般对这些材料不加以辨别。

和《韩非子》同时期的典籍,本文还涉及了《战国策》、《庄子》、《荀子》、《管子》、《墨子》等,其中有的典籍的成文时代需作点说明:《庄子》,一般认为《内篇》为庄周手笔,战国中期作品,《外篇》、《杂篇》是弟子后学所作,成于战国晚期以后;《管子》,旧题管仲作,这可能是依托。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是齐稷下学者撰述,记录了管仲的一些言行和思想,大部分作于战国中晚期,少数可能成于汉初;《墨子》也不是墨翟手著,而是墨家后学记录编辑而成,也是战国中期以后的作品。

第二章 语义研究(上)

《韩非子》是一部哲学著作,语义上有其独特的个性,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战国一般词汇的发展,又可以领略到作者个人对语义发展的影响。

战国时期,基本词词汇体系是继承春秋而来的,其中的核心部分没有什么变化,如:人、物、心、大、小、多、少、不、有、无、……这些词稳定性强,它们的基本词义变化较少。基本词汇中也有部分词义发生了变化,表现出新的面貌。

语义的分析,我们以《韩非子》材料为主,兼顾同时期其他典籍,如《战国策》、《吕氏春秋》等,以使得出的结论有较广泛的意义。

在《韩非子》语义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试图扩展到一般意义上的语义研究,以反映专书研究对一般语义理论的意义。

语义研究分为两大部分:第二章一般词语语义分析和第三章特殊词汇的语义分析。一般词语指常用词,这部分主要集中于对基本词汇的发展变化的探讨,以展示战国时期基本词汇的新面貌,特殊词汇指各学派的专用术语,这是哲学著作中的特有内容,对这部分词语进行语义分析、语义网络的系联,可以充分展示韩非个人对语词的影响,也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领会韩非的思想体系。

第一节 大量出现新词的时代

语言发展的速度主要反映在新词产生的数量上。新词是指形、

音、义的新的组合,不包括异体字、古今字。《韩非子》所反映的新词充分说明,战国末期是汉语激变的时期。这些新词数量大,使用频率较高,而且多数使用范围广泛,在同时期的其他典籍中也有用例,说明这些词一产生就显示了极强的生命力,为丰富和发展汉语的表达能力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它们大多至今仍活跃在口语和书面语中,在实践中证明了它们的价值。

这些新词有单音节的,也有多音节的。其中尤以复音词为多。显然,这些新词基本上反映了口语的发展。词语从口语进入书面语往往需要一个时期的酝酿,进入书面语的新词一般来说已经是水比较成熟的了,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承认。因此,我们通过书面语来讨论当时语言中的新词,首先要明确这些词在当时已经不是很“新”了,它产生的时间往往要稍早些。其次要认识到它的成熟性、社会性。新词的淘汰率是很高的,而我们看到古代典籍中出现的新词却很少被淘汰掉,原因就是书面语中的新词已经是经淘汰后留下的精品,同口语中的新词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也有部分新词是作者创造的,他们根据词法规则新造一些词来表达思想,这部分词主要是复音词。汉语复音词的能产性给作者创造新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汉语发展史上,许多语言巨匠灵活地、极富创造性地贡献出大批新词新语,促使了语言的进步。个人创造词语是汉语发展的动力之一。《韩非子》中,无处不闪耀着作者高超的语言鉴赏力和创造力。一部著作吸收了多少当时口语中的新鲜成分,是衡量作者语言能力的重要尺度。

下面我们按单音词和复音词两类,举例说明《韩非子》中的新词。

单音词:

瘦

全书共出现两次:

- ① 中山有贱公子,马甚瘦,车甚弊。(内储说下)

② 公子甚贫，马甚瘦，王何不益之马食。（内储说下）
又《庄子》中一见：

③ 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已矣。（盗跖）

此词先秦用例很少，《庄子·盗跖》属“杂篇”，所以此词应产生于战国末期。至汉以后用例渐多，如：

④ 神农憔悴，尧瘦臞，舜微黑，禹胼胝。（淮南子·修务）

另有异体“腹”，《广雅·释言》：“腹，瘠也。”用例如：

⑤ 赵简子乘弊车腹马。（说苑·反质）

船

全书共三见：

① 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功名）

② 千钧得船则浮。（功名）

③ 锱铢失船则沉。（功名）

这个词在战国时用得比较普遍，《庄子》中出现4次，《墨子》中出现6次，《战国策》、《管子》等书中也都有用例，如：

④ 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船来触舟。（庄子·山木）

⑤ 有渔父者，下船而来。（庄子·渔父）

⑥ 至于泽畔，方将杖屦而引其船。（庄子·渔父）

⑦ 船，木也。（墨子·小取）

⑧ 并船以为十临。（墨子·备水）

⑨ 必善以船为辂楫。（墨子·备水）

⑩ 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战国策·魏四）

汉·扬雄《方言》卷九：“舟，自关而西谓之船，自关而东或谓之舟，或谓之航。”可见此词来自方言。从典籍看，产生于战国中后期，使用频率还不很高。